

博士文丛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golians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ultural Changes

文化变迁中的

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

陈·巴特尔 著

蒙古教育出版社



G759.2
25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golians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ultural Changes

文化变迁中的

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

陈·巴特尔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陈·巴特尔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311-5911-2

I. 文… II. 陈… III. 高等教育: 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蒙古族 IV. G6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143039 号

博士文丛

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

陈·巴特尔 著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内蒙古瑞德教育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呼市分公司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22 500

版本/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200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 30 号

电话/(0471)6961597 邮编/010010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号: ISBN 7-5311-5911-2/G · 5414

定价: 23.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序 1

我是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在比较研究各国各教育的时候就发现，各国教育虽然受到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十多年前我就提倡研究教育要重视文化研究。文化都是民族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所以说，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体现在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教育上。按照文化学者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多个层次。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比较容易改变的，精神文化则具有相对的稳固性，是不容易变革的。但是，文化总是要发展的，不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总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不过精神文化变化得缓慢一些，而且总是较多地保存着民族的特点。因此民族文化总是带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种特性。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有它的相对独立性。教育一方面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教育又对文化有传播、选择、改造的作用。民族文化的变迁总是在教育的影响下悄悄地进行的。根据陈·巴特尔的研究，蒙古民族文化的最大的变迁是蒙元帝国时代，是在学习儒家文化和蒙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后来的变迁，特别是内蒙古民族也是在和汉民族共同抗击外国侵略，共同吸收外国文化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文化。这里民族高等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过去教育研究中只研究汉族教育，很少研究



序

少数民族的教育。这是一大缺陷。少数民族虽然人口相对较少,但是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只有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才能真正认识中华民族的整个教育,促进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近年来,民族教育的研究已有所开展。如贵州师范大学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研究当地水族学习数学的特点;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都设有民族教育研究所,研究当地少数民族教育;世纪末由广东、云南、广西等几个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史》三卷本,收录了二十六个少数民族的教育。但大多数研究着重于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制度上,很少把教育与本民族的文化变迁联系起来。陈·巴特尔的专著把蒙古高等教育的研究与蒙古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这在民族教育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专著还总结出了蒙古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体现了蒙古教育的民族特性。因而这部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研究民族教育需要做田野工作。一个客民族的学者去研究主民族的教育,往往有隔靴搔痒的感觉,除非你到主民族中去生活一段时期,做深入的田野工作,才能真正了解主民族的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一个主民族的学者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教育要深刻得多。当然主民族学者研究本民族教育也会有主观的影响,但只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就能把问题说清楚,说全面。陈·巴特尔就是这样,有着开阔的视野和胸怀,能够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深刻地揭示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变迁的深刻内涵和发展前景。这是一部民族教育研究的力作,读来深受教育。要我写几句话,以此为序。

序言

2004 年 7 月于北京求是书屋

序 2

我国青年学者陈·巴特尔同志所撰写的《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是一本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对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宏观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蒙古民族高等教育及其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这项研究运用历史学的理解—解释研究范畴，将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对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萌芽、产生、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且对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现状及其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这是一本观点新颖、资料丰富、研究方法科学、富有创新意义的专著。这在国内单个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研究是迄今所仅见的，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部专著凝聚了陈·巴特尔同志历经三个春秋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辛勤劳动，同时凝结着众多学者专家的心劳与期待，特别是得益于他的导师文辅相、赵炬明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与帮助。在2003年6月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经专家评审，全体评委一致认为这是一片独具特色和富有创新意义的优秀博士论文，并建议修改出版。毕业后他依然孜孜不倦，潜心钻

研,结合专家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近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就是陈·巴特尔同志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值得祝贺!读了这本书,主要有以下几点感受:

特色鲜明、创造性成果突出。这本书首创把单个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研究。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在总体上,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对国内55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进行单个研究更是尚无先例。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在目前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完整地研究单个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演变及其特点的成果,这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具有特殊的首创意义。

思路新颖、视野宽阔。在探究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及其特点时,作者提出了多纬度、多视角的研究思路,剖析了蒙古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变迁与高等教育演变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连接关系,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根据这一思路该书以蒙古民族历史发展为纵坐标,以蒙古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族际交往为横坐标,以历史发展与族际交往的交汇处上所凝聚的文化变迁及教育演变为主线,绘制出一幅跨越12个世纪时空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历史图景,不仅研究的思路新颖,而且气势恢宏,求实创新,材料翔实,论证充分。

体系完整,结构严谨。这本书从概念的定义界定与表述到框架结构的构建,形成比较完整的内容体系。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内容衔接自然,结构严谨,内

在逻辑性较强,论述比较科学,重点突出,主线鲜明。本书的完成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研究功底、良好的研究素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本书结合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际选择了这样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不仅选题方向正确,而且研究目的明确,其研究价值是十分肯定的。作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新时代的发展大势,对我国蒙古民族高等教育中目前存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提出的目前民族高等教育研究明显存在的“三重三轻”的倾向,提出的处于全球化、一体化双重背景下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问题,提出的从单个民族入手,从这个民族文化变迁的角度考察其高等教育演变过程及其特点的观点等不仅富有创新性,而且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示,为我们研究民族高等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认识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产物,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族际交往过程中汉民族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也不断接受汉民族文化,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作者运用族际交往发生的文化变迁作为研究蒙古民族高等教育演变的背景和动力,揭示了蒙古民族高等教育与汉文化高等教育、藏文化高等教育、满文化高等教育、西洋文化高等教育的互动连接关系,对于合理解释多民族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多元与一体的生成、转化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促进民族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民族教育政策法规具有很大的应用参考价值。此外,该成果对于开拓蒙古学研究的新领域,丰富我国民族高等教育历史

研究的内容,深化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最后,我们在此预祝作者在民族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为繁荣发展我国的民族高等教育学术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序

2004年6月于武汉南湖中南民族大学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历史研究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蒙古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文化变迁的次序,将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第一阶段,自8世纪后半叶蒙古人西迁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形成民族共同体为止,这是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是蒙古民族传统游牧文化得以形成和定型的重要时期。在蒙古社会出现了适应当时文化发展需要的“高深学问”以及传授这些学问的高等教育方式,即原始宗教知识和萨满教仪式,部族历史知识和家庭口承教育,军事知识和“怯薛”制度,并出现了蒙古文字和宫廷学校。

第二阶段,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南下开始,到14世纪晚期蒙元帝国衰落、蒙古汗廷北迁蒙古本土为止,这一阶段为嫁接中原汉文化高等教育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蒙元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高深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一种全新的具有多民族特点的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建立;出现了专门独立的教学机构,初步建立了教育制度,这些标志着蒙古民族高等教育从萌芽状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以及“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

第三阶段,从14世纪晚期元廷北迁开始到清末满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为止,属喇嘛教寺院高等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蒙藏文化由接触而融合,结果导致蒙古地区自上而下,全民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教,并在清朝达



到高峰。喇嘛教寺院高等教育是蒙藏文化综合的产物。在学问上,喇嘛教构建了一套由显至密的具有不同次第的知识体系;在教育上,建立了一套以“札仓”为基本单位的严格的修习制度和学位制度。在这里,高等教育探求喇嘛教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喇嘛的功能合二为一,表明蒙古民族寺院高等教育走向定型。除此之外,一部分蒙古人主要是蒙古八旗的子弟,在满清举办的汉式高等学校(如国子监)和满式高等学校(如八旗官学)中接受高等教育,学成后成为满清帝国的高层统治人才。

第四阶段,从清末至现在,这一阶段为蒙古民族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时期。外力的冲击、清廷治蒙政策的改变,使得处于封闭状态的蒙古文化有机会再次与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发生接触。清末新政中创办的满蒙文高等学堂是西学东渐、汉学北移的结果,是蒙古民族第一个具有现代高等教育性质的高等院校。民国时期,受中外多种政治力量(苏俄、日本、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和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蒙古民族出现了政治与文化分野。高等教育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多元分化并步入了“科学”阶段。漠北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在体制和思想等方面深深印上了苏联高等教育的烙印;漠南内蒙古出现了三种办学主体不同、培养目标各异的高等教育模式,即国统区的“送出去”(将蒙古族子弟送到内地或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模式、日伪区的殖民高等教育模式和解放区的延安民族学院高等教育模式。1947年,内蒙古成为我国统一的民族自治区后,蒙古民族高等教育成为我国多民族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发展除了受主体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还受到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在当代,就整体而言,蒙古族子女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接受高等教育,一是在国家创办的普通高校,特别是在内蒙古的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另一个是在国家特设的民族院校接受高等教育。而这两类高校在其演变过程中在许多方面诸如培养目标、专业和课程设置、招生对象等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另外,在内蒙古地区高等学校内设立的蒙语授课高等教育是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形式。



ABSTRACT

The disserta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analyses. Based on the course of Mongoli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sequence of cultural changes, the Mongolians higher edu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whose developing status and features in each specific stage are to be sorted out and discussed about. The first stage lasts from the Mongolian people westward moving in the latter half of 8th century until the time when the Mongolian Plateau was unified, the great Mongolian state was founded and an ethnic community was formed. This is the embryonic stage of the Mongolians higher education when the Mongolians traditional nomadic culture to be formed and finalized. "Great Learning" and relevant higher educational ways appeared to meet the need of curr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ribal historical knowledge, primitive religions knowledge, military knowledge were respectively to be taught by means of family oral instructions, Shamanism rites and "keshig" system. Meanwhile, the Mongolian writing and imperial school came into being. The second stage starts at the beginning of 13th century when Genghis Khan went to conquer the west and fight for the occup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ends at the end of 14th century when the Mongolian—Yuan Empire was on the wane and its imperial court moved back to its native land. In the stage, the Han nationality'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as grafted into the Mongolian society. In cultural value orient-

tation, the Mongolian authorities worshiped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thus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reat learning of the Mongolian society and mixing together the Mongolians culture and the Hans culture out of conflict. Highe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entered on the great learning of Confucianism. Then a total new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its Multi-nationalities was established and specialized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ppeared, marked as new phase of the Mongolians higher education followed by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pluralism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the classical learning academy's bureaucratization", "the intermittent imperial examination" are the main fea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Mongolian — Yuan dynasty. The third stage begins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of Yuan Empire northward moving in the late of 14th century and stops when the Qing dynasty began to waver in its final years. Lamaism Monastery higher education took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stage. The Mongolians culture began to bridg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ibetan culture and finally they mixed together so that all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were converted to the Tibetan Buddhism — Lamaism, even reaching its peak in the Qing dynasty. Accordingly, Lamaism Monastery higher education occurred as a synthesis of the Tibetan culture and the Mongolians culture. On academy, Lamaism established a set of knowledge system with different levels . On education, it also established a rigid set of study and diploma system. In the period, higher education's seeking Lamaism great learning and fostering senior Lamas was finalized as a special function of it. Besides, small parts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main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Eight Banner attended the Hans model higher institutions and the Manchu model higher institutions owned by the Manchu Qing court, after graduation, they became the advanced rulers of the Manchu Qing Empire. The fourth stage, from the final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until present, is marked as phase of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ongolians higher education. At that time, foreign force's influence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Manchu's policies of governing the Mongolians have given a way for the isolated Mongolians cultur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Hans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Manchu—Mongolians college was set up under the new policies of the Manchu—Qing Empire at the final years of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influences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the Hans culture's moving to the Northern China. The college is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modern Mongoli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mixture of political influences (like Soviet Russia, Japan, KMT and CPC)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ethnic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have marked itself as a divid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ne. Thus higher education stepped into the phase of "science". Under the support of USSR, Outer Mongolia was founded as a new country, closely follow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oughts of USSR. However, in Inner Mongolia, appeared three different higher education models with different governors and goals. In the KMT—governed area, Mongolian students were sent to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land or abroad and colonized higher education was held in the invaded area controlled by the Japanese while in the liberated area, Yanan ethnic college was established. In 1947, Inner Mongolia became one of the unified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 and its ethnic higher education became a part of national ethnic higher education for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its higher education, affected both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ethnic policies, in many aspects has shown its differences. Nowadays, generally Mongolian peopl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two channels: first, they are educated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especially those in Inner Mongolia; Second, they entered the

ethnic college or universities specially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 These two kinds of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development, have show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many aspects like educational goals, specialties and curriculum, and the enrolment. Beside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Mongolian language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s an important and unique form presented in the ethnic Mongolia higher education.

目 录



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

1

内容提要	1
英文提要	3
第一章 导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目的与预期价值	2
三、有关概念的界定与阐述	4
四、研究文献综述	5
五、研究方法	8
六、论著的基本思路	10
第二章 蒙古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变迁与高等教育的演变	13
一、蒙古民族历史的发展	14
二、蒙古民族文化的变迁	23
三、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	29
第三章 蒙古民族传统高等教育的萌芽	42
一、部族历史知识和家庭口承教育	43
二、原始宗教知识和萨满教仪式	46
三、军事知识和怯薛制度	49
四、蒙古文字和宫廷学校	53



第四章	蒙元时期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66
一、多元的国子学和国子监	71	
二、官学化的书院	87	
三、时断时续的科举取士	98	
第五章	明清时期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118
一、喇嘛教寺院高等教育	122	
二、满清帝国时期蒙古民族高等教育	157	
第六章	蒙古民族现代高等教育的嬗变	175
一、清末蒙古民族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满蒙文高等学堂	182	
二、民国时期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多元分化	188	
三、民族区域自治下的蒙古民族当代高等教育	200	
结 论	220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32	